

太行山红色歌谣革命话语演进及特征研究

邹蓓蓓, 冯小红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 河北 邯郸 056005)

[摘要]红色歌谣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以声音的形式表达和传播革命思想。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革新的话语体系,经过革命化改编的歌谣把党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传播到社会各阶层,太行山红色歌谣在革命斗争中具有重要作用,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文章以太行山红色歌谣为中心,系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话语的建构实践与演进历程,总结太行山红色歌谣在传播主体、内容、渠道、效果及话语建构等方面的演进特征。太行山红色歌谣记录并保存了太行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蕴含着太行根据地党的革命奋斗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表达与塑造,对于强化政治文化认同,增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以及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太行山红色歌谣;革命话语;演进特征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5.04.01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5)04-0094-07

歌谣作为植根于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表达,以其独特的方式生动展现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镜像。不同历史时期,歌谣不仅承载着时代的记忆,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在革命战争的特殊年代,红色歌谣作为革命时期一种特殊的文艺传播形式,以一种声音的感性力量表达传播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把革命思想、党的方针政策编写成通俗易懂、平仄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的歌谣,使广大民众在相互传唱中接受党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提高了革命宣传的实效性。这些经过革命化改编的歌谣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

太行山文书^①作为近年来新发现的民间文献,收录了一批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②,计60余件。太行山红色歌谣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革命奋斗的辉煌历程和革命精神内涵,反映了太行革命根据地革命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关于红色歌谣研究,历史学、文学、政治学、传播学及社会学等领域均有涉及,但在区域研究方面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如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等革命老区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华北抗日核心的太行根据地红色歌谣关

注得较少。基于此,本文以太行山红色歌谣为中心,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话语建构实践,系统解构太行山红色歌谣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话语建构与演进特征,通过微观文本与宏观语境的互动,探究革命话语的建构历程,增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历史借鉴。

一、红色歌谣的诞生

“红色歌谣”萌芽于“歌谣运动”,并随着五四新思潮的传播而开展。1918年,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开展征集、编订、出版歌谣,带动歌谣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等人,向校长蔡元培提议征集歌谣。随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歌谣征集活动迅速开展起来。1918年,《北京大学

^①太行山文书是2013年底邯郸学院从晋冀鲁豫交界的太行山地区征集的民间社会历史文献。这批文献时间上起明万历年间,下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散前夕,目前入藏总量已达25万件。

^②红色歌谣,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群体创作的,以宣传革命思想、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为主题的民间歌谣。

[投稿日期]2025-02-27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优先关注课题(编号:BDEA2020011);邯郸学院硕士学位点建设专项研究专项课题(编号:HDXY202507)

[作者简介]邹蓓蓓(1984—),女,河北邯郸人,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红色文献、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

日刊》上刊登了两则公告,即《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和《校长启示》。公告发布后,歌谣征集活动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广泛搜集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谣,从此掀起了全国性的歌谣运动。“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政治运动是前几年思想启蒙的结果,而学生运动又推动思想文化的发展。”^{[1]3}1920年,蔡元培等发起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在此带动下,全国各省纷纷开展收集整理民间歌谣的活动,许多刊物开辟了“歌谣”专栏。1922年,北大歌谣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在创刊号上,对近五年歌谣的征集情况作了总结:“我们征集了几年的歌谣:现在差不多二三千,再拿地方来说也有二十二省。”^[2]歌谣运动的初创期,胡适、蔡元培、刘半农等人的倡议,带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歌谣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的引领下,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化重新进行了审视。他们广泛征集歌谣,呼吁民众觉醒,唤起革命斗志,实现思想解放。这期间征集的歌谣多是抨击旧社会和旧制度的腐朽,悲叹底层民众的困苦生活,教育唤醒民众,呼吁民族的觉醒,改良社会,开启民智。

1923年,党中央制定了《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指出:“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3]206}全国广泛发动农民参加革命,鼓励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深入田间地头,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党的政治主张。1926年,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记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好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4]301-302}。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一些振奋人心的歌谣,如《打倒列强》等。1928年,《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指出“最好编成歌谣韵语”^{[4]489}。1929年1月,毛泽东同志以歌谣体形式,正式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5]2}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古田会议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

命高潮等红军总任务”^{[6]96},并且提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责督促及调查之责”^{[6]96}。1931年,《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提出:“必须编辑各种最通俗的小册子,做反帝、拥护苏联、土地革命、八小时劳动日的宣传与鼓动。”^{[7]336}1932年,张闻天同志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谈到:“利用图画,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群众的宣传鼓动方法,向广大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我们还没有系统的开始。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的方式,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然而我们并没有把这些方法充分的应用。”^{[8]456}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工作,让更多的群众支持红军,参与到革命中来,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9]90}毛泽东同志要求红军每到一处,就组织专人印刷标语、传唱红色革命歌曲、表演革命题材的话剧等,通过传唱歌谣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火种。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红军的宣传活动深入开展,广大民众满怀革命热情自发传唱歌谣,轰轰烈烈的歌谣运动深入开展并有序地发展起来,红色歌谣诞生了。

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结合严峻的革命形势,将太行山区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谣融入革命话语,汇编成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红色歌谣。中国共产党将编写的歌谣以话剧、戏剧等形式向民众传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民众了解党的政策方针,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太行山红色歌谣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革命斗争的各个时期,将革新的话语体系,经过革命化改编的歌谣把党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传播到社会各阶层,融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二、太行山红色歌谣革命话语的演进

红色歌谣作为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宣传工具,通过传唱、表演等形式,宣传革命,批判敌人,将革命话语传播到社会各阶层,确立革命话语的主导地位。太行山红色歌谣记录并保存了太行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蕴含着晋冀鲁豫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奋斗史。一些脍炙人口的红色歌谣在革命老区保存完好,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更是在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形成的表达规则和话语实践,是一种权力形式。话语权力通过语言和符号系统塑造社会,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太行山红色歌谣通过语言符号传递革命理念、发动群众,从而塑造集体记忆。它以歌谣的形式传播,通过革命话语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其情感表达与思想塑造紧密相连,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话语权、塑造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太行山红色歌谣不仅承载着革命宣传功能,还体现了大众传播、群体动员与革命文化认同的互动关系。本文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及传播效果等方面,系统分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等各个历史时期,红色歌谣的传播及演进的历史作用。

(一) 民族救亡的话语转向:抗战歌谣的情感共同体塑造(1937—1945年)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红色歌谣以“民族救亡与统一战线”为传播主题,传播内容从阶级斗争到民族主义叙事,由“打土豪”等土地革命口号,转向宣传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激发民众的民族仇恨和抗战必胜的革命信念。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编写的红色歌谣,通过民间文艺形式与革命意识形态结合,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思想武器。太行山红色歌谣借鉴民歌、小调、秧歌等,植入民族救亡的革命话语,构建敌后根据地的文化宣传阵地,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救国的革命意识转化为民众熟悉的语言符号,通过组织巡演或田间传唱等形式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塑造全民抗战的集体认知,为巩固敌后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一时期具有典型代表的有太行山文书收录的《救亡期间适用小学常识课本》《抗日三字经》《抗日儿童读本》等。《抗日儿童读本》^①三字一句,以三言的形式,痛斥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廿六年,七月七;卢沟桥,起冲突;飞机炸,大炮击;毁我田,烧我屋;抢我钱,夺我谷;见妇女,任侮辱;东北人,泪犹湿;此仇恨,何时息。……不论男女,不分老幼,一齐起来抗日;统一战线,扩大巩固,一定是我们的。”《抗日儿童读本》通过具象化语言和苦难叙事,激发人民群众的阶级仇恨,“军阀们,把权专;争势力,夺地盘;拉锯战,又连年;兴杂税,派苛捐;征粮秣,要银钱;老百姓,遭摧残”。“民间苦,难尽言;内乱生,外患连;小日本,逞凶蛮;东四省,强占完;领凶兵,打进关”,唤

起民众产生情感共鸣,激发民族义愤。红色歌谣以情感化的通俗表达方式,形成情感驱动,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认可革命,将爱国主义情感与政治符号融合,在传唱歌谣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想内,把革命情感转化为持久性的集体记忆。

语言工具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语言工具的有效使用、思想理论的话语宣传,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争取胜利的重要武器……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在不断变迁、发展,其声音也从最初青涩、零散、略欠饱满的口号、演讲、政论文章,逐步演绎成系统、完整、日趋成熟的符合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话语体系。”^[10]中国共产党通过语言工具的宣传,开展话语建设工作,将革命思想融入百姓易于接受的民间歌谣,从而获得百姓对党的认可,构建革命话语体系,实现革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即强调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进行社会变革,而非强制性的文化渗透取得支配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重视语言工具的运用,通过话语系统开展革命意识形态的宣传,将其转化为群众易于接受的文化形式,从而赢得群众的支持和理解,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抗日救亡期间的常识课本展示了语言文字的宣传魅力。其采用方言俚语等形式,结合百姓的切身利益,将抽象的革命话语转化为百姓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使革命理论生活化和大众化。《救亡期间适用小学常识课本》^②旨在宣传抗日救亡,激发人民行动起来,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革命歌》《国耻》《雪耻歌》《捕汉奸》《救国会》《勇士歌》《我们的宣传队》《在寒假中做些什么》等。《革命歌》中“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因为政体不良才革命。打倒专制皇帝,将民权还给老百姓。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因为受外族压迫才革命。打倒帝国主义的强权,发展我们民族的优性。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因为受经济侵略才革命。打倒不平等的制度,充裕民生,节制资本。”它以深入浅出的语言,

①《抗日儿童读本》收录于太行山文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进行的革命教育读本,传播对象以儿童为主,通过情感叙事宣传抗日思想,首行“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末行“统一战线,扩大巩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全文65句,277字。

②《救亡期间适用小学常识课本》收录于太行山文书,1938年9月清丰县丽文书店发行,由冀鲁豫边区保安司令部与小学教材编辑委员会联合编纂,是冀鲁豫边区在全面抗战初期的革命宣传教材。

从政治、经济、主权等方面宣传革命的意义,号召大家积极参加革命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雪国耻》中“雪国耻,雪国耻,先要同心结团结。团结坚,感情联,不怕死,不畏难,争回民族自由权。争回了,自由权,牺牲身体心也安。”它以朗朗上口的歌谣的形式,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抵御侵略,争取民族自由。催人奋进的《勇士歌》,以慷慨激昂的言语,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我是个勇士!我是个勇士!怕强固可羞,欺弱更可耻。我是个勇士!我是个勇士!我固不贪生!却也不空死!我是个勇士!我是个勇士!我帮助人家!忘记了自己。”《我们的宣传队》为民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我们的宗旨是要启迪民众的爱国思想,激发他们抗敌的情绪”。《在寒假中做些什么》组织号召民众支持抗战,开展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以唱歌、演剧、游行演讲等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思想,发出革命的召唤。“敌骑纵横,山河破碎,我们应当怎样干?前线抗敌的将士,饮食不均,衣服薄单。我们应该设法去募捐!受伤的兵士,呻吟在病院,我们应该组织慰劳团!民众不知救国家来参战,我们应该设法去宣传!我们队伍,是儿童团姐妹团,我们不怕风吹,不怕雪打,不怕严寒!我们的方法是唱歌、演剧、游行演讲。我们的目的是抗战!抗战!我们的口号是干!干!干!”纵观《救亡期间适用小学常识课本》,抗日宣传工作有序展开,步步深入,层层递进。《革命歌》分析国内的革命形势,宣传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雪耻歌》以歌唱的形成,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革命,构建革命主流的意识形态。《勇士歌》以激进的歌谣体形式,激发人民报国恨家仇,鼓舞革命斗志,壮大革命力量。《我们的宣传队》团结发动一切力量,组织抗日宣传工作。《在寒假中做些什么》在后方支援前线,为抗日战士喝彩。晋冀鲁豫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编写了红色歌谣,把抽象的革命话语转化成易懂、易学、易传的大众化语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便于大众学习和传播。如《老百姓日用杂字》^①从衣食住行、教育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宣传教育百姓齐心合力发展生产,鼓足干劲支援前线战士保家卫国。“亲族邻里,爱如一家。发生纠纷,调解为佳。……政府法令,讨论宣传。……拥护军队,帮助机关。困难相助,利益共沾;军民团结,兄弟一般;齐心合力,抗战共产;救国责任,大家负担;边区军民,要做模范;准备反攻,收复河山;全国解放,人人喜欢。”中国共产党将抽象的革命理论浸润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歌谣传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革命理论大众化。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歌谣宣传引

导边区军民,增强他们的革命意识,对革命的胜利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阶级斗争的话语重构:解放战争歌谣的革命意识形态整合(1945—1949年)

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歌谣的传播发生了重大转变。传播内容从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转向阶级斗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控诉地主阶级的压迫,号召人民群众翻身作主,开展土地革命,通过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宣传,传播革命歌谣,为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太行山红色歌谣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宣传的重要工具,既延续了抗战时期的宣传传统,又针对解放战争阶段的新形势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从抗日民族主义转向反蒋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话语,实现革命意识形态宣传的持续有效,展现了红色歌谣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解放战争时期的歌谣,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战斗性,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中国为核心内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谴责蒋介石卖国丧权,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反蒋斗争。系统化的革命话语建构,为解放战争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和群众动员。太行山红色歌谣运用革命话语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通过民间艺术形式,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转化为群众易于接受理解的政治认知。红色歌谣的生动意象为民众所接受,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从而实现革命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如《保卫咱的好时光》^②“叫一声老乡听我讲,卖国汉奸本姓蒋。蒋介石丧天伦,枪口对着自己人。美国枪,美国弹,装备起来打内战。老乡们,咱们想想,从前过的啥时光。斗争果实刚到手,不能叫走狗来抢走。青年民兵是自卫队,还有咱们的妇女会。磨刀擦枪打石雷,人人武装要自卫。武装起来有力量,保卫咱们的好时光。”解放战争时期的歌谣带有革命性和政治色彩,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构建人民反内战、反压迫的革命话语体系,充满坚强的革命斗争信念,呼吁人民翻身做主,共同解放全中国。

^①《老百姓日用杂字》收录于太行山文书,辛安亭编,新华书店发行。该书分上下两栏,上栏采用木刻版画的插图形式,下栏是四言杂字,四字一句,首行“上学识字,先认姓名”,末行“革命恩德,永世不忘”,每行8字,共13页,1312字。

^②《保卫咱的好时光》收录于太行山文书,采用太行山方言词汇,进行情感动员,构建革命话语体系。首行“叫一声老乡听我讲,卖国汉奸本姓蒋”,末行“武装起来有力量,保卫咱们的好时光”,简短有力,每行7—9字,全文26行,114字。

(三) 革命记忆的再生产:新中国成立初期歌谣的谱系延续与建设动员(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红色歌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内容和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时期的歌谣,既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宣传形式,又在此基础上注入新中国的时代内涵,成为歌颂新政权、动员群众参与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宣传载体:在传播内容上,从革命叙事转向国家建设为主题,将革命时期的政治宣传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宣传;在表现形式上,既保留通俗化的传统特色,又沿用歌谣体形式,使文化传播具有延续性;在话语体系上,将红色歌谣用于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突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积极内容。红色歌谣的广泛传播,不仅巩固了国家新生政权,还塑造了新一代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观念,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时期的歌谣展现了新中国革命奋斗的艰辛历程,同时也展现了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人们从万恶的旧社会中解放,歌唱凯歌,赞美社会主义新制度和新生活。新中国时期的歌谣,表达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反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发展进程。这些在太行山红色歌谣中多有反映,如《农民三字经》《俗话本》《农民识字课本》《农民业余学校识字课本》《(农村适用)民校识字课本》等。《农民三字经》^①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它以革命亲历者的身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历程。它以民间歌谣的形式,将革命话语与生活话语相融合,通过革命意识形态的教化,使广大民众在传唱中自然接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色歌谣,既是革命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建设国家政策传播的载体。新时代太行山红色歌谣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新中国建设的发展历程,实现了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太行山红色歌谣革命话语的演进特征

“我国歌谣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歌谣经历了多次变革,由简单的劳动呼声,发展成独具特色的艺术,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表现出前后的联系和影响”^{[11]359}。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将传统歌谣改编成具有革命特色的红色歌谣。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谣宣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在民族危亡之际,红色歌谣鼓舞革命斗志,痛斥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呼吁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号召全国力量团结起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动革命文化的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广大民众遭受阶级的压迫,红色歌谣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构建人民大众的革命意识形态。红色歌谣运用“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等语言,强化阶级对立,让广大民众意识到受阶级压迫和剥削,唤醒民众思想意识的觉醒,通过革命行动来改变自身的命运。红色歌谣将阶级矛盾话语植入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构建人民大众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的话语体系。

太行山红色歌谣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动态演进的传播过程。红色歌谣的创作与传播,始终与党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其演进过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将大众的民间文艺转化为革命宣传动员的有效工具,从而构建革命的话语体系。“歌谣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空间的推移,歌谣本身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况之中,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歌谣的内容和形式往往因时而异,形成了歌谣的时代性、地方性、民族性等。”^{[12]37}太行山红色歌谣的演进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从传播主体来看,太行山红色歌谣是由中国共产党、革命战士、革命亲历者到群众参与,再到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战士是红色歌谣的创作和传播的主导力量,通过文艺宣传唤醒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亲历者、基层民众积极参与红色歌谣的创作与传播,成为宣传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媒体的介入使传播范围迅速扩大,红色歌谣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根据地发展到全国,发展成全民参与的革命文化。

从传播内容来看,从民族救亡到阶级斗争,再到国家政权建设等主题,红色歌谣的宣传主题随着革命进程不断更新。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谣以抗日救亡为主题,激发民众的革命斗志;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歌谣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红色歌谣以巩固新生

^①《农民三字经》收录于太行山文书,封面有“向全秀记”,抄本首行“天荒荒,地荒荒,不识字,是文盲”,末行“灭中国,鬼阴谋,被识破,驱逐它”,三字一句,每页8行,共14页,1176字。该书采用口语化、方言的形式,内容涵盖识字启蒙、生产知识及革命斗争等。

政权,建设国家为主题,号召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演进过程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创新宣传策略,从大众的民间文艺形式转化为有效的政治传播,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

从传播渠道来看,太行山红色歌谣的传播形式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依靠口头、文艺、标语等形式,在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行传播。这种传播形式虽受传播范围的限制,但因贴近民众的生活,在群众中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传播渠道逐步拓展为报刊、广播等大众媒体,太行山红色歌谣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文化体系的逐步建立,太行山红色歌谣通过识字教材、电台、影视等现代传播媒介,实现系统化、立体化的传播。

从传播效果来看,太行山红色歌谣的演进过程体现了从情感动员到意识形态的内化,再到政治文化认同的演进过程。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红色歌谣通过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和阶级仇恨,在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山红色歌谣在发挥群众动员的同时,更加注重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化培养,使广大群众在思想深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太行山红色歌谣既延续了革命传统的育人功能,又肩负起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使命,实现革命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从话语建构来看,太行山红色歌谣展现出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抗战时期,太行山红色歌谣采用“苦难—救亡”的叙事体系,通过叙述民族苦难以激发民众的救亡意识。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山红色歌谣发展为“压迫—解放”的阶级话语体系,通过揭露剥削阶级的压迫以唤起民众的革命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太行山红色歌谣形成了“建设—发展”的话语体系,通过催人奋进的话语宣传,凝聚民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家园。这种话语建构的演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要求,不断改变宣传内容,优化话语表达的政治智慧。

总体来看,太行山红色歌谣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地域性特色。其语言表达运用了方言、俗语等,既通俗易懂又富有地域性色彩。这种地域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结合,使太行山红色歌谣在保持政治性和宣传性的同时,又不失民间文艺的生动

性和感染力,成为革命话语地方化实践的典范。太行山红色歌谣革命话语的演进,展现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演进过程,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也为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四、结语

太行山红色歌谣真实地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心声,展现了在中国革命艰辛道路上构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记录了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历程。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太行山红色歌谣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经岁月的沉淀,依然在人民心中流传,形成了革命记忆。太行山红色歌谣记录了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革命历程,蕴含着伟大的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太行山红色歌谣的演进脉络,有助于把握革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挖掘其时代价值。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和挖掘太行山红色歌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重温革命历史能够让中国人民从革命文化遗产中汲取精神力量,挖掘红色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为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洪峻峰.思想的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常惠.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J].歌谣周刊,1922,1(1):1.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 [6]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8]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老一辈革命家论党的建设(第二卷)[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
- [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 [10]姚朝华,谷超.有声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变迁及发展探要[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3):129-140.

[11]张紫晨. 歌谣小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社,1993.

[12]赵晓兰. 歌谣学概要[M]. 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责任编辑 李瑞萍]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the Red Ballads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ZOU Beibei, FENG Xiaohong

(“The Taihang Mountain Document Research Center of Handan University”, A Key Research Bas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Hebei Province, Handan, Hebei 056005, China)

Abstract: The red ballad, a distinct carrier of culture, expresses and spreads revolutionary thought with its special power of sound and rhythm. From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through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o the Liberation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pread the Party's political views and ideology to all social strata through its innovative discourse system and revolutionary ballads. In this sense, red ballad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nd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Centering on the red ballads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this paper has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practice and evolu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rough the Liberation War to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ballads in terms of their disseminators, content, channels, effects,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ed ballads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have recorded and preserved important revolutionary materials in this region. They also contains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struggle history in the Taiha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Besides, these red ballads have exemplified the Party's expres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Therefore, the red ballads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hold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olstering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enhancing the communication level and influence of red culture, advancing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new era, and constructing China's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Key Words: red ballads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